



CCES

CCES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陆 铭 潘 慧/著

政企纽带

民营企业成长与企业发展

Political Conn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Enterprise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CES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陆 铭 潘 慧/著

政企纽带

民营企业成长与企业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企纽带:民营企业成长与企业发展/陆铭,潘慧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

(CCES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301 - 16302 - 3

I. 政… II. ①陆…②潘… III. 私营企业 - 企业家 - 研究 - 中国
IV. F27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4297 号

书 名: 政企纽带——民营企业成长与企业发展

著作责任者: 陆 铭 潘 慧 著

责任编辑: 朱启兵 袁 辉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6302 - 3/F · 234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em@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144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 1 导论:新型的政企关系? / 1
 - 1.1 政企纽带与民营企业发展:研究的背景 / 2
 - 1.2 研究的问题、贡献与意义 / 6
 - 1.3 研究的方法 / 8
 - 1.4 内容与结构 / 11
- 2 政府、企业和企业家:“关系”是第一生产力? / 13
 - 2.1 政企关系与市场体制的两重性 / 14
 - 2.2 政府、企业和企业家:基于调查的发现 / 27
 - 2.3 小结 / 41
- 3 企业家与企业发展: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决策方式 / 42
 - 3.1 企业家重返舞台:文献评述 / 43
 - 3.2 企业家与企业发展:实证模型及数据描述 / 47
 - 3.3 实证结果 / 53
 - 3.4 小结 / 62
- 4 企业家参政议政:政企纽带的建立 / 63
 - 4.1 企业家参政议政的背景 / 66
 - 4.2 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数据描述 / 70
 - 4.3 企业参政议政的决定因素 / 73
 - 4.4 小结 / 77

5 企业家满意度:政府干预影响了什么? / 80
5.1 “快乐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知道了什么? / 81
5.2 企业家满意度的数据描述和模型 / 88
5.3 企业家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 / 96
5.4 企业家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关联 / 100
5.5 小结 / 102
6 政企关系的过去与未来(代结论) / 104
6.1 政府、企业和企业家之间的互动:我们知道了什么? / 104
6.2 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基业常青? / 107
6.3 转型的终结? 有关政治与经济的一点余论 / 110
附录一 “民营企业家与企业发展研究”调查问卷 发放情况说明 / 118
附录二 调查问卷 / 120
附录三 企业家心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140
参考文献 / 144
后记 / 157

1

导论:新型的政企关系?

如果将中国经济比喻成一辆奔跑着的汽车,那么,政府提供了这辆车行驶的道路,劳动者是这辆车的各种部件,而企业家则是这辆车的司机。

毋庸置疑,企业的发展最为直接地体现了中国经济在过去 30 年里取得的成就。未来,如果没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①)的发展壮大,中国要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大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企业这辆快跑着的车,理解政府和企业(企业家)的关系,就像理解司机和路的关系一样,成为研究中国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在展开这项研究的时候,我们不禁问自己,如果既不打算像记者一样去讲述企业发展的神奇经历,又不愿只是列举一些体现企业增长速度和结构调整的数据,我们还能够用怎样的方式来刻画中国企业的故事?这时,我们想到了企业家。但我们脑海里的企业家并不是出身低微、经历曲折的神话主角,而是在现代市场体制里最为重要的一个主体,是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不够重视的一个群体。与那些描述企业发展历程和企业家传奇的作者相比,无论他们用了怎样瑰丽的语言,也无论他们有多么丰富的案例和数据,我们对中国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发展的研究视角显然更为微

① “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的概念比较模糊。通常人们指的“民营经济”在广义上是对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而狭义的民营经济则不包含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本书中,我们所称的民营企业是狭义的。民营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加起来被称为“非公有制企业”,如果再加上集体企业,则被称为“非国有企业”。在第 3 章至第 5 章的实证研究中,有时出于简便,我们所说的民营企业也包括了为数不多的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样本。

观。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在企业的发展进程中,企业家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从企业的发展中获得了什么?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过程中,企业家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通过研究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有关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侧面,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侧面。

市场从来就不是完善的,也不是平等的。市场交易并不是匿名的,价格机制也不是中性的。市场交易的非匿名性恰恰是市场不完善的重要体现,也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所忽视的。对于企业发展而言,大量的非价格机制存在于市场之中,而这些非价格机制的运作是围绕着企业家展开的。拥有不同政治身份、政治纽带(political connection)和家庭背景的企业家在表面上公平的市场机制里有着不同的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于是,企业家的差异转化成了企业发展的差异。企业家和企业的互动关系折射出市场机制的两面性——一方面,市场的价格机制是公正的,每个人都可以按市场价格获取资源;另一方面,市场的价格机制又是不公正的,每个人按同样的价格可以获取不同的资源,或者每个人获取同样的资源可以支付不同的价格。当我们通过理解政府官员的行为来理解政府,并且通过理解企业家的行为来理解企业的时候,一个由政府(政府官员)、企业和企业家构成的市场体制将浮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个体制的核心就是“政企纽带”^①。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市场体制的演变将走向何方?关于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如何共同左右资源配置和人类行为,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一个前沿的话题。让我们先从中国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的大背景开始我们的话题。

1.1 政企纽带与民营企业发展:研究的背景

如果离开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的情形,真是很难想象。非国(公)有经济在30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非常迅速。截止到2007年,国有和集体单位之外的就业已经

^① 在本书中,当我们提到政企纽带时,就是指企业(家)的政治纽带。或者说,政企纽带是政治纽带在政企关系中的具体体现。

占到全部城镇就业的 3/4,而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扣除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后的其他类型企业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 93.86%、70.46% 和 65.85% (参见图 1.1)。这一组数字同时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虽然非国(公)有经济在总体上壮大了,但它们在产出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低于在企业数量中所占的比重。未来的中国经济如果要继续高速增长,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强大的民营企业,中国经济是不可能进入发达状态,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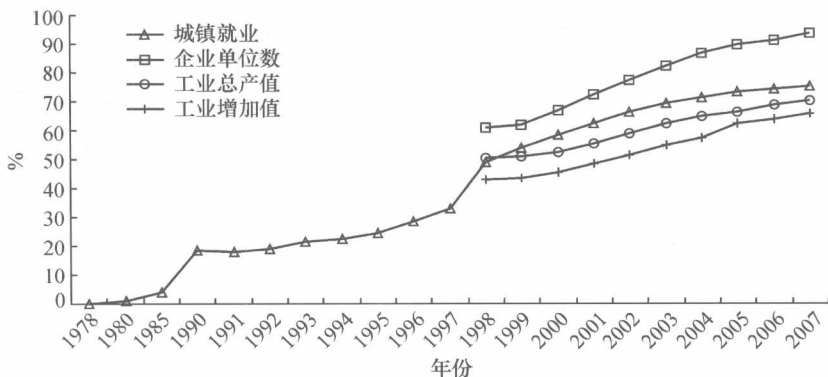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非国(公)有经济的比重(1978—200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城镇就业比重为扣除国有和集体单位后其他就业的比重,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比重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扣除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后的其他类型企业所占的比重。

那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到底遇到了什么障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当然,金融是重要的,创新也是重要的,这些都被谈论得够多了。这里,我们想拎出来两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和民营企业家们接触时被反复提及的两个问题,一是企业怎样传承,二是企业规模如何做大。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有化改造之后,新一代的民营企业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只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事。直到邓小平南方讲话的 1992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仍然占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提供的城镇就业的80%左右。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史并不长,而具体到特定的企业,其“年龄”超过20年的并不多。^① 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步入老年,企业的传承和企业家的接班人问题显得日益突出。

企业的接班人问题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特别是在那些带有家族企业性质的民营企业。那么,为什么唯独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寻找接班人那么难呢?对这个问题,人们众说纷纭。在一次作者主持的有关民营企业传承的研讨会上,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经理市场不完善,空降到企业来的经理人并不一定具有领导企业的才能;也有人说,是因为资本市场出了问题,如果资本市场没有发现企业价值的功能,对职业经理人的绩效评价就变得非常困难了;还有人说,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家观念保守,总是想从自己的子女当中找接班人;甚至有人说,都怪计划生育政策,外国的企业家有很多子女,而中国的企业家往往只有一两个孩子,选继承人的难度当然要大得多。^② 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有一种非常难以传承的“企业家才能”,那就是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而比这种能力更为难以传承的,则是企业家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我们相信,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不会否认,与政府搞好关系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太重要了,而这种政企纽带恰恰是与企业家个体结合在一起的,既难以传承,也难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来获得。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了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获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恰恰是这样的发展模式给企业的传承和持续发展套上了无形的枷锁。

每个企业都不能不与政府(而且往往是特定的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否则,企业的日子就会很难过,这个无形的枷锁不仅套住了企业的传承,

^① 在我们所收集的企业样本中,“年龄”超过20年的企业仅占6.53%。

^② 在那次研讨会上,日本企业家甚至建议中国企业家把有才能的外姓经理人认做“干儿子”,来解决家族企业难以找到接班人的难题,而且,一位日本企业家非常认真地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成为接班人的。

也限制了企业的扩张。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间市场分割,尤其是在省与省之间。^① 各个地方的政府都认为,对本地企业采取保护措施,限制外来竞争,有利于本地经济的成长,当然也就有利于本地的就业和税收。在这种“以邻为壑”的增长模式之下,虽然从单个地方来看,的确有可能在分割市场的过程中获得更快的增长,但从整个国家来说,却损失了规模经济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在那些经济开放度比较高的地区,可以借助加入国际市场来发展经济,当地政府就更有能力通过分割国内市场来发展本地经济(陆铭和陈钊,2008)。^② 正当中国的地方政府陷于“以邻为壑”的增长模式难以自拔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想到,政府保护本地企业的做法已经严重地限制了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在我们与企业家接触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听企业家说,他们不敢轻易到别的省去投资,除非在当地有政府官员朋友。可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以前,企业小的时候,政府保护当地企业,企业很欢迎,那时候,仅本地的市场规模就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了。现在,随着企业的长大,本地的市场规模显得太小了,企业已经有了跨省进行投资的需要,但是,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的政企纽带却是本地化的。如果企业都因为没有其他地方的“关系”而不敢去投资,那企业还怎么做大?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必然越来越取决于民营企业的表现。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什么优势的话,在今天,我们还会列举诸如人口红利、高储蓄率、外资、政治稳定这些因素,以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将越来越重要。规模经济重要性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手机,现在,最新的手机产品可以说都是首先在中国推出的,这与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庞大有关。特别是在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的时候,中国靠国内市场规模来推动内需的发展路径将越来越重要。就在这样的转型时期,政企纽带也日益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桎梏,它一方面阻碍了企业的传承,一方面限制了企业的规模,对于

① 关于市场分割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请参见陆铭和陈钊(2006)的总结。

② 与我们的研究有些异曲同工的是,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利用出口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本地的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有所下降。

成长中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政企纽带的这种两面作用,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正是因为政企纽带的重要性,我们将偏离传统的分析方法,不再仅仅将企业看做把资本和劳动转化成产品的生产线,也不再讨论由董事会、经理和股东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而是把政府(政府官员)、企业和企业家互动的市场体制作作为研究企业家成长和民营企业发展的大背景。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企业将是一个开放的组织,企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将变得不那么清晰。

1.2 研究的问题、贡献与意义

作为一本研究性的著作,我们必须将有关政企纽带和民营企业发展的故事转化成为研究性的问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劳动者)作为三个主要的行为主体,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好像是劳动者和资本的组装车间,企业家退到了幕后。这本书的意图是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企业家,我们将把企业和企业家作为两个不同的主体。尽管在理论上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是,从实证上重视企业家却是在近些年的经济学研究中刚刚成为热点。^① 政府、企业和企业家构成的三角形成为联系我们的实证研究的框架,由于企业家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独立的主体,传统的“政企关系”衍生出了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以及企业和企业家的关系,而这两组关系又成为经济学近年来研究的焦点问题。

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蜻蜓点水般地回顾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为企业家的奋斗史提供宏大的叙事背景,或者以企业家的个人传记来作为企业发展的一个侧面,这样的作品已经非常多。我们的目标是把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工具作为研究企业家和企业发展的显微镜。具体来说,我们的研究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反映企业家和企业发展的图景:

第一,企业绩效是怎样决定的?除了通常被人们所熟知的企业自身的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所有制这些因素之外,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政

^① 在本书的作者看来,有关企业家的数据难以得到,肯定是相关的实证研究滞后的首要原因。

治身份和决策方式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将综合展现上述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根据研究的进展，我们将更为集中地关注企业家的决策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第二，什么样的企业家在参政议政？在一个政府、企业、企业家关系紧密的经济里，企业家参政议政对企业发展有利，那么，怎样的企业家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机会？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实力如何为企业家参政议政提供支持，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权力如何转化成为政治权力。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企业家的父辈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又如何被他们所继承。

第三，企业家的满意度有哪些影响因素？如果说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灵魂，那么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则是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关键。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分教育和健康两个主要的方面，在企业家的教育水平稳步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家的身心健康却较少得到关注。由于企业家属于社会上较为富裕的群体，而收入高者通常也拥有更好的身体健康水平，因此，我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满意度指标上。在一个满意度决定因素的研究框架里，我们综合地考察了企业家个人特征、企业特征和政府干预的变化对企业家满意度的影响，其中，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反映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政府干预的变化这一因素对企业家满意度的影响。

虽然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能够构成相对独立的三项研究，但贯穿这些实证研究的却是一个政府、企业家与企业互动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而是一个用于刻画政府、企业家和企业之间互动关系的模型，在传统人们所熟悉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政企关系”基础上，我们特别强调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一个是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企业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必须将政府、企业家和企业三者放在一起才能把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所处的背景勾勒清楚，即使是在人们所熟悉的“政企关系”这一问题上，也不能缺乏企业家作为纽带。有意思的是，在政府和企业家这一对关系上，我们的研究恰恰与国际学术界有关政治纽带的研究合拍，而在企业家和企业这一对关系上，国际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的企业家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也正在兴起。

从相对独立的各章来看,本书回答了一系列有关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发展的问題,但将它们放在一起时,我们则试图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为政府、企业家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寻求经验证据。我们的研究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非匿名的一面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中国是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传统。这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究竟走向何方?这是一个一直萦绕在我们心中的更为宏大的问题。^①显然,为企业发展和企业家成长的研究加上这样一个问题意识是有趣而且必要的。

1.3 研究的方法

这是一项非常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经济学和心理学是支持这项研究的两大学科。整个研究是用经济学的框架来建构的,但在回答我们所关注的三个核心问题时,心理学被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具体来说,在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中,企业家的决策方式本身就是领导心理学的内容;而对于经济学来说,对企业家决策方式的研究则打开了企业家这个“黑箱”。企业家的满意度在我们的研究中被证实是一个与企业家心理健康高度相关的指标,而满意度的决定又属于“快乐的经济学分析”。

本研究还借鉴了管理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知识。管理学一向重视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甚至将经理能力决定企业绩效的上限表述成了“经理封顶定理”。如果说经济学在借鉴管理学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那是因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坚持了经济学的基本实证框架,并且将企业家的因素作为决定企业绩效的新的因素,在我们的研究中,将企业家因素具体化为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决策方式等几个方面。

企业家的参政议政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话题。政企纽带是一种特殊的“关系网络”,对于经济学来说,政治纽带有利于企业发展已经是一个被研究揭示的现象,因此,企业家的政治纽带是如何形成的又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① 在之前的一系列研究中,这个问题也始终是我们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来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见陆铭等(2008)的总结。

除了企业发展给企业家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之外，处在一个政府与市场结合非常紧密的环境中的中国企业家们，他们得到了什么？在经济学研究中，随着快乐经济学的兴起，研究者们开始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满意度（或者说幸福和快乐）的决定因素，于是，经济学最终与心理学走到了一起。经济学研究利用了心理学的度量，经济学研究的发现也利用了心理学的理论解释。

为了回答萦绕在我们心中的那些问题，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企业家与企业相匹配的数据库，它应该包括企业与企业家的两个方面信息，而且，在企业家问卷中，除了通常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家庭背景方面的信息以外，还应该包括那些能够反映企业家性格、决策方式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信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企业和企业家信息相匹配的数据库，我们必须自己展开调查研究。为此，我们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工商联合会合作开展了这项调查研究。^① 在国际上，企业和企业家匹配的数据非常珍贵，事实上，能够将两者的信息进行匹配的数据库非常有限。例如，国家统计局开展的经济普查数据就没有企业家的信息。在我们进行自己的调研之前，在中国，同类的数据库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1993—2006年间持续开展的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大型调研，这个数据库的数据分析结果已经公开出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07）。但是，对于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而言，它所包含的信息是不够的。

需要说明的是，大范围的调查与小范围的调查有各自的优缺点。大范围的调查通常更受研究者欢迎，它的主要优点是数据的覆盖面广，变异性（variance）大，在统计上易于识别出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大范围的调查的缺点是，调研的成本非常大，不易于实施，因此，在调研成本的控制下，既有的大范围调查往往以研究者认为必不可少的变量为主，这时，特定研究所需要的变量（比如本研究所需的某些企业家特征）往往不被包括在内，影响了大范围数据对特定研究的可用性。^② 另外，大范围调研的数据

① 关于柳州的概况，请参见柳州政府的官方网站（<http://www.liuzhou.gov.cn/mlz/zjlz/index.htm>）。

② 统计部门提供的大范围调研数据通常都有这种缺陷，当然，统计部门数据的可得性是另一个大问题。

可能来自很多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制度、文化等难以测量的差异可能很大,这些差异都对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有影响,这时,就可能对模型的估计产生遗漏变量的偏误,这种问题对截面数据模型特别难以处理。^①相比之下,小范围的、小样本的调查虽然有覆盖面小的缺点,在特定的问题上缺乏代表性,甚至可能因为数据的样本量小,变异性小,而可能导致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无法识别出来。在实际的操作中,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模型,其中个别变量的系数符号符合理论预期,但却在统计意义上不够显著,这种情况往往就与样本量不够大有关。但是,尽管小样本的数据有这样的缺陷,但它的好处是,根据研究者的需要,有可能包含一些大样本数据所没有的信息。来自特定地区的截面数据还较好地避免了未观察的地区间差异(比如制度和文化)所导致的估计偏误。但是,必须承认,个人层面的遗漏变量偏误和联立性内生偏误^②在本书的三个主体章节中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处理,因此,本书的实证研究结论严格来说不应理解为因果关系,而只是一种相关性。内生性偏误在当代实证研究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要克服内生性偏误却常常受到数据和方法的限制。在实证研究本身不能确定因果关系的情况下,研究者所发现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还取决于研究者和读者的理论解释。

在我们的研究中,最易受到质疑的是来自欠发达城市的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以及与样本代表性有关的结论是否具有一般性的问题。事实上,任何基于特定范围之内的样本的实证研究都存在外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的问题,在遇到这一问题时,研究者只能从理论上去判断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否依赖于样本来源地的某些特殊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研究的结论就具有了一般性。在本研究中,读者将会看到,我们得到的主要结论在理论上并不依赖于柳州的特征,比如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

① 对于面板数据(panel data)而言,如果可以假设未观察的因素是不随时间变化的,那么,可以用差分法或去均值法(de-mean)来控制未观察的固定效应。对此,凡是介绍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教材都有介绍。

② 遗漏变量偏误(missing variable bias)是指,被观察到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实际上是因为有若干未观察到的变量,这些未观察到的因素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有影响。而联立性内生偏误(simultaneity bias)是指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解释变量的系数并不表示它对被解释变量因果意义上的影响。

有些在理论上可能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结论,比如说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利于企业发展,在其他更大范围的研究中,甚至在其他国家的研究中也发现过,因此具有很强的一般性。在这一意义上,本书的研究结论是可以用于讨论当代中国的企业家成长与企业发展的。至少,鉴于我们的样本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因此,本书对于推动此类企业的发展更有意义。

1.4 内容与结构

本书是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6 年度重大项目“中国民营企业成长与企业发展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06JJD790007)的最终成果,共分 6 章,其中,主体是第 2—5 章。在第 2 章中,我们从理论上建立了一个分析企业家与企业发展的框架,这个框架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而是一个用于刻画政府、企业家和企业之间互动关系的模型。

在“政府、企业家与企业”这样一组三角关系中,我们整合了课题组有关企业家和企业的三项研究,构成了本书的第 3—5 章。在第 3 章中,我们将研究企业家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控制了一些传统人们所关心的因素之后,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决策方式都对企业的绩效有显著影响。特别的,我们发现具有独裁特征的企业家指示性决策方式对企业绩效有正面的影响。第 4 章是一项有关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研究,在政治资本对企业发展的确重要的背景下,企业家参政议政成为建立政企纽带的重要途径,我们发现,在企业家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过程中,企业特征和家庭背景非常重要,个人特征(除了党派身份)却相对不重要。第 5 章里,我们再次关注企业家个体,研究企业家满意度的决定。企业家满意度是企业家生活质量的一个综合指标,而且我们发现企业家满意度与心理健康具有很强的联系。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个人特征在决定企业家快乐感的过程中似乎并不重要,相比之下,企业家工作

的外部环境却很重要,具体来说,如果企业家认为他(她)^①的企业受到的来自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他的满意度将显著更低。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结论,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总结。第3—5章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其结论在每一章都有详细的交代,第6章的目标是进一步总结全书,阐述本书的意义,并讨论有待今后研究的问题。

^① 在英文的经济学文献中,为了避免性别歧视的争议,在用单数人称时,通常用 she,或者 he 和 she 的结合体(s)he。在本书中,为了适应中国既有的表述习惯,再加上男性在我们的企业家样本中占了绝大多数,因此,我们在后文中都用“他”来指代第三人称单数。